



[英] 弗·福赛斯 著

翻译 王爱飞

校审 赵常欣

魔鬼的 选择

昆仑出版社

魔鬼的选择

〔英〕弗·福赛斯著

翻译 王爱飞

校审 赵常欣

昆 仑 出 版 社

根据READERS' DIGEST BOOKS 1980 Volume 2 译出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魔鬼的选择

[英] 弗·福赛斯 著

王爱飞译 赵常欣校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965毫米1/32·印张7.25·字数16,5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1987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1,001—31,100

ISBN 7-80040-016-6/I·16

书号 10282·26 定价 1.30元

译者前言

对弗雷德里克·福赛斯这位英国作家和他的作品，我国读者并不陌生。好几年前，我国便翻译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豺狼的日子》。书中描写了法国一个地下组织为了使法国政府改变其对非洲的政策，在几次谋杀法国总统戴高乐失败之后，雇佣了一个代号叫“豺狼”的职业刺客，在法国举行庆典时行刺戴高乐，终于被法国安全部门所消灭。该书在我国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福赛斯于一九三七年生于英国。大学毕业后，即过上了记者生涯，先后为路透社等几家英国大新闻机构工作，并被派驻过德国，西班牙，印度等地。一九七六年，福赛斯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豺狼的日子》使他一举成名。其后，他又创作了《奥德萨档案》、《雇佣军》、《魔鬼的选择》、《第四次协议》等小说，受到世界读者的欢迎，有的印数高达千万册，还被改编成电视，电影，使他跻身于西方著名作家之列。

福赛斯的小说大都以真实的国际事件为背景，力图通过一些具体事件，反映当今世界各大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揭示历史不平衡发展的一些基本动向。福赛斯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写一本书，他都要进行实地考察，采访人物。他说，“书中所写的人物我大都接触过，所报道的事件我大都经历过。”《魔鬼的选择》是福赛斯的第三部小说，书中以美苏两大国限制战略武器和粮食会谈为背景，设置了一系列曲折、紧张的情节，描写了美苏及西方各国在重大国际危机到来之时的决策过程，塑造了一些栩栩如生，感人可信的人物，对我们了解国际政治、军事斗争有一定的帮助。

译者

1986年11月15日

第一章

要不是意大利水手马里奥眼尖，等不到日落，那条小船上的遇难者恐怕就一命归天了。到人们发现他时，他已完全失去了知觉。他身子几乎全裸，暴露在外部分已被无情的太阳烤成了二度烧伤，而没有受到灼伤的部位浸泡在小船沉积的海水中，又白又软，像是已经腐烂了的鹅肉。

马里奥·库乔是意大利货轮加里波底号上的厨师。这是一条又旧又锈的船，行速缓慢，它从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启航，在吭哧吭哧地往东穿过黑海之后，驶向普因斯，到土耳其北部海岸东角的特拉布宗去装运杏仁。

马里奥自己也说不清，他为什么会在1982年4月的那个上午偏要把他那桶土豆皮倒下船栏杆，而不是倒进船尾的垃圾槽，也许是为了呼吸呼吸黑海上的新鲜空气吧，他才会踏上甲板，将一桶厨房的脏物倒进了船下的大海。然后，他回转身，慢吞吞地走向他的厨房。刚走了两步，他倏地站下了，皱着眉头回到船边上。

他手搭凉棚，眯着眼向船后的大海眺望。正午的阳光几乎垂直地射在他脸上。但他已能肯定，方才他在奔涌的蓝色海浪中，已看见了什么。由于无法确认，他又爬上了通向船桥翼舱的外梯，再度寻望。顷刻之间，在缓缓涌动的波峰浪谷之间，他清晰地看见了那个目标。他连忙转身，穿过开着的舱门走进舵舱，大声呼喊：“船长！”

船长维托里奥·英格洛开初对马里奥的报告并不以为然，但作为一个饱经风霜，地地道道的水手，他十分明白，要真有那么个人被遗弃在茫茫大海上，他有义务调转船头，靠拢

去寻察一番。结果 花了半个小时，加里波底号开回到了马里奥所指明的地方。这时，英格洛船长自己也看清了。

这条小船大约有十二英尺长。如果船上曾有过桅杆，那也早就折断漂走了。加里波底号 在起伏涌动的海浪上 停下来，英格洛船长俯身在船桥栏杆上，望着马里奥和水手长保罗·朗希驾着摩托救生艇将小船带到货轮边上。

小船上的人仰面躺在几时深的海水之中。他面目憔悴，形消骨瘦，满脸胡须，神志不清。在水手们扶住他已晒脱了皮的肩头，将他搬上货轮时，他发出了几声微弱的呻吟。

遇难者被抬进了船上的救护室，船长指定由马里奥负责护理。厨师很快便把这个人当成了他的私人财产。为了减轻遇难者的痛楚，水手长朗希从急救箱中取出一针吗啡，对他进行了注射，接着，两人便着手处理他身上的灼伤。

作为意大利南部人，他们对治疗太阳灼伤略知一二，并为此准备有疗效卓著的油膏。马里奥从他的厨房里端来了一盆用新鲜柠檬汁和葡萄酒对半搀和的洗擦液，从他自己的枕头中扯了一大团松软的棉花，又端来一大碗冰冻尼古茅果。他先将棉花在洗擦液中浸湿，用它包了十几个茅果，再将它轻轻地按压在被阳光中的紫外线严重灼伤的部位，一团团雾气从接触之处升腾起来，马里奥配制的冰冻收敛剂将暑气和热量吸出了烤坏的皮肉。遇难者发出了一阵阵颤抖。

“这么痛一阵子总比灼死了的好。”马里奥用意大利语对他说。但就算他听见了这句话，也没法明白它的意思。

小木船被吊到了后甲板上，水手长走出救护室，来到后甲板船长身边。“那人身上一无所有。”朗希报告说。“没有表，也没有写有名字的东西。唯一的身外之物是一条劣质内裤。”

“小船上也一无所有，”英格洛船长说，“没有桅杆，没有帆，也没有桨。甚至连船号都没有”。

“难道是哪个海滩胜地的游客，被风刮到海上来了？”朗希问。

英格洛耸耸肩。“也许是那条小货船上的幸存者。还有两天我们就到特拉布宗。只要他醒过来能开口了，土耳其当局会搞清的。好吧，我们继续航行吧。噢，我们得给在特拉布宗的经纪人发个电报，把救人的事告诉他。另外，我们进港后，要辆救护车。”

两天之后，依然神志不清的遇难者被裹进白布单里，送进了小小的特拉布宗市立医院。陪同去的有马里奥和他们的船在特拉布宗的经纪人。马里奥在病人的床边呆了一个小时，即便向这位依然不醒人事的朋友道了别，回到了加里波底号。

这时，另一个矮而壮实的男人由一名警官和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陪同站到了床边。三个人都是土耳其人，但这位身着便装的人能勉强说几句英语。他名叫乌米特·厄达尔，是伦敦劳埃德航运保险公司在特拉布宗的代理人。遇难者之事是加里波底号的经纪人通知他的。

“他会复元的，”医生说道：“但目前他确实病得太厉害了。中暑，二度太阳灼伤，还有通体的曝晒。水手们大概是用从伤处驱热的方法救了他的命。我们已用炉甘石水给他洗了浴，这有助于治疗。现在他只有指望真主了。”

这时，病人那张胡须丛生、呈深栗色的脸上眼睑微微眨动了几下。厄达尔连忙俯下身子，用他最为娴熟的英语缓慢而清晰的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病人发出低沉的呻吟，将头从一边偏向另一边。“热拉

兹享依。”他模模糊糊地低语道，“热拉兹享依。”

厄达尔直起身。“他不是土耳其人。”他用肯定性的语气说。“他像是叫热拉兹享依，可能是个乌克兰名字。”

他身旁的两人都耸耸肩。“我将把此事向英国的劳埃德保险公司报告。”厄达尔继续说道。“也许他们会有黑海上船只失踪的消息。”

《劳埃德船行消息报》算得上是世界商业航运界的每日圣经，它所有的社论，专栏和新闻全都只围绕一个主题——航运。消息报在英国埃塞克斯郡科尔切斯特的一幢楼里编辑出版。乌米特·厄达尔在将来往于特拉布宗港口的船只运输情况电报给这幢大楼之后，特地添加了一则小消息，以引起劳埃德情报所的注意。情报所查询了它的记录，证实了近期内黑海上没有船只失踪的报告，并将此事通报给了消息报的编辑室。第二天，报纸作了简短报道，其中包括遇难者说出的那个词。

《劳埃德船行消息报》的大多数读者，对特拉布宗尚未查明身份的遇难者的报道，大都是一览而过，未加重视。只有一个人的锐利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这则消息上。他三十出头，是伦敦一家不大的船业经纪行里颇受重用的高级职员。同事们都叫他安德鲁·德雷克。

在仔细研究完报纸上的消息之后，德雷克走进公司董事会会议室，查询了世界气象图表，开始研究上面标注的盛行风和洋流。春夏两季，黑海的主要风向是由北而来，而海潮则绕着这个不大的海洋以反时针方向流动，从西北面的乌克兰南部海岸，往下经过罗马尼亚和比利时，再往东穿过位于伊斯坦布尔和开普因斯之间的船运道。

德雷克根据风向和洋流立即进行了推算。一条从乌克兰奥德萨南面的德涅斯河三角区出发的小船，借助顺风和洋流，每小时可向南面的土耳其航行四至五海里。但三天之后，由于风向和海潮的变化，它会往东驶离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向黑海东头。根据《劳埃德船行消息报》的报道，九天前，这个地区曾出现过恶劣天气。德雷克推测，很可能小船在这里遭了殃，船被打翻，刮断了桅杆，船里的物品被狂风恶浪洗劫一尽，只剩下船的主人继续经受狂风和烈日的煎熬。

两小时后，安德鲁·德雷克决定安排自己从五月三日，即下星期一开始一周的休假。在等待假日开始的日子里，他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激动。他买好了由伦敦至伊斯坦布尔的来回车票，再由伊斯坦布尔转特拉布宗。他之所以为此行激动，是因为他感到在多年的期待之后，终于找到了他在苦苦寻找的那个人。

和两天前呆在遇难者床边的那三个人不同，安德鲁·德雷克知晓“热拉兹享依”这个词的意义。它并非一个人的名字。遇难者是用乌克兰语在说“被出卖了”——这意味着他很可能是乘船外逃的乌克兰地下游击队员。而安德鲁·德雷克本人，尽管他有一个英国化的名字，也是一名乌克兰人，而且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

一到达特拉布宗，德雷克便拜访了乌米特·厄达尔。德雷克是从消息报某位朋友那里打听到他的。至于对这位来访者出于什么原因要去见当地医院里的那个病人，厄达尔则未提半句问题。他提笔给医院院长写了一封介绍信。这样，刚吃过午饭，德雷克便被带进了病人的小房间。

厄达尔已经告诉过他，在大部分时间里，病人一直是沉睡

不醒，除了那个名字之外，他再也没有吐露过只言片语。德雷克走进病房，见遇难者双目紧闭，仰天躺在床上。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床边，久久注视着病人枯槁的面庞。然后，他俯过身，在病人耳边清晰地说了一声“乌克兰没有死亡”。这是被莫斯科当局禁止了的乌克兰国歌的第一句歌词，任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听到它，都会立即为之动情。

病人的眼睛猛然睁开，怔怔地注视着德雷克。“你是谁？”他用乌克兰语问。

“和你一样，一个乌克兰人。”德雷克回答。病人的眼里浮现出一丝疑惑。

“我是英国国籍，”德雷克平静地说道，“我在英国出生长大，我母亲是英国人，可我父亲是乌克兰人，而我心里，和你一样，是个乌克兰人。”

病人的目光死死地盯住顶上的天花板。

“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护照，那是伦敦发的，说明不了什么。如果你想看，随便哪个契卡分子都可以弄一张来蒙你。”德雷克用了“契卡”这个老说法来指苏联的秘密警察。“但你已不在乌克兰了，这儿也没有什么契卡分子。你被一条意大利货轮从海上救起，送到了土耳其。你现在是在西方，成功了。”

病人的眼光移到德雷克的脸上，满含警惕，想证实这是否是一番真话。德雷克朝窗口点点头。“克格勃可以把他们的人装扮成医院的土耳其人，”他说道，“但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他们完全可以行刑逼供的人而把全城的人都变个样。你能坚持着走到窗口来吗？”

病人下床蹒跚着来到窗前，望着街道上的景象。“那些轿车是从英国进口的奥斯汀和莫里斯牌，”德雷克说道。

“还有从法国进口的皮沃兹牌和西德的大众牌。公告栏上全是土耳其文。那边有一幅可口可乐的广告。”

病人的眼睛眨了几下。“我成功了。”他喘声道。

“是的，”德雷克说，“你创造了个奇迹。”

“我的名字，”遇难者又躺回到床上，“叫米诺斯拉夫·卡明斯基。我是乌克兰捷尔诺波尔人，是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乌克兰地下小组的负责人。”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卡明斯基讲述了他和另外六名组员都是捷尔诺波尔人，渴望在当地建立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并决定要对在他们土地上肆虐的俄罗斯化政策以反击。因为莫斯科当局的政策是要完全清除乌克兰的民族艺术，文学，语言以及民族意识。在他们六个月的活动，中共伏击和杀死了两名基层政府官员和一名克格勃分子。接着便被出卖了。

那天，他们小组正在开会，克格勃的特别部队包围了那幢农房，那个告密者也在枪林弹雨中被当场打死。只有卡明斯基冲了出来，象野兽一般穿过灌木丛。白天，他就躲在树林里，一到晚上便摸向海边。最后，他终于到了德涅斯特河边上一个小渔村，并在那里偷了一条小木船。他从未驾船出过海，对航海之类的事一无所知。他一面紧把住舵，一面不停地祈祷，在风暴到来之前，他一直是根据星星和太阳的位置向南漂行。

完全是靠了运气，他这条小船才躲过了苏联的巡逻艇和海岸雷达的监视。接下来，他在向南航行到罗马尼亚和克里米亚半岛之间时，迷失了方向，小船继续南漂。他遭受了风暴袭击，小船被风浪打翻，靠着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他一直抓住翻转过来的船身，度过了一个魔幻般的黑夜。到清晨，

他才翻转过小木船，重新爬了进去。他为了凉爽而脱放在船上的衣物，早已被风浪席卷一空，仅有的那壶淡水也翻进了海里。风帆和船舵也已渺无踪影。痛苦随着东升的旭日来临了，逐渐强烈的阳光象针一般炙刺着他的肌肤。风暴袭击后的第三天，他便失去了知觉。等他清醒过来，已经躺在了床上，默默忍受着灼伤带来的疼痛，听着身边那些他原以为是比利时人的谈话。一连六天，他都双目紧闭，没有吐露只字片语。

安德鲁·德雷克异常欣喜地听完了卡明斯基的讲述。他终于盼来了他等待多时的人。“我会想办法从伊斯坦布尔的红十字会为你搞一份旅游的证件。”德雷克说道。“也许我还能把你弄去英国，至少，可以寻一份临时护照，然后再要求避难。用不了几天我就回来。”

走到门边，他又站下了。“你很清楚，你回不去，”他对卡明斯基说道，“不过，只要你帮忙，我能去。这是我求之不得的。”

五月十六日，安德鲁·德雷克从伊斯坦布尔飞回到特拉布宗，带回了从红十字会为卡明斯基搞到的证件。他给伦敦挂了个电话，为延长他假期的事同经纪行主要的合股人大吵了一场，不过这是很值得的。通过卡明斯基，他可以完成多年来在他胸中鼓荡燃烧的唯一宏愿。

从表面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是铁板一块，但是，它却一直有两个颇为头痛的问题。其一是养活它众达两亿五千万的人口，其二是国内的民族问题。在莫斯科所统治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有好些并非俄罗斯人，其中人口最众，民族意识最强的，恐怕要算乌克兰人了。到1982年，乌

克兰加盟共和国的人口已达七千万，这成了当局要特别对它实行严厉的俄罗斯化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它的历史渊源。

乌克兰一直被第聂伯河分为两半。东乌克兰俄罗斯化的倾向稍重，在沙皇的统治下生活了好几百年。与此同时，从基辅伸延到波兰边境的西乌克兰，曾相继受过波兰，奥地利，还有往昔的奥匈帝国的统治。它在精神上和文化倾向上一直都更具有西方化的倾向。

1918年，奥匈帝国瓦解之后，西乌克兰竭力想从帝国的毁灭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但他们的努力遭遇了失败。1919年，波兰将其吞并，称其为东加利西亚省。1939年，在希特勒涌进西部波兰之后，斯大林的红军也从东面开进，占据了加利西亚。1941年，它落入了德国人手中。乌克兰人心中的各种希望、恐惧和忠诚强烈地扭结交织在一起。有人曾希望，如果他们起来反击德国人，莫斯科便会向他们作些让步；另一些人则认为，一个自由的乌克兰只有在柏林打败莫斯科之后才可能出现。于是，他们穿上了德国人的军装，加入了乌克兰师，同德国人一起攻击红军。另外，象卡明斯基父亲这类人，则逃入喀尔巴阡山中，谁侵入这块地方就向谁开火。但他们的所有梦想都破灭了。莫斯科赢得了这场战争，并把其势力范围推展到波兰新的边界布格河边。但是，多少年来燃烧在乌克兰人心中的愿望并没有因之而熄灭。

安德鲁·德雷克的父亲斯蒂潘·德拉克在加入乌克兰师之时，还是一名来自罗夫诺的学生。他是众多的幸运者之一，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在1945年被英国人俘虏。接着，他被送进了英国的劳动营。在英美依据雅尔塔协定，将两百万战

争难民和战俘送回到苏联时，德拉克毫无疑问属于被遣返之列。但幸运又光顾了他。在英国诺福克郡的一个草场上，他遇上了一位英国姑娘，并很快使她怀上了孕。接下来便是结婚。出于一种同情，他没有遭到遣返，并获准留居英国。婚后，他不再从事农活，而是在布拉德福德，这个拥有三万乌克兰人的英国城市开了一家小小的无线电修理店。第一个孩子生下不久便夭折了，第二个孩子生于1950年，教名为安德里。

安德里在父亲的膝下学会了乌克兰语。从父亲口里，他还了解到自己祖国的情景，以及喀尔巴阡山、罗森亚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原野。他受到了父亲厌恶俄罗斯人观点的薰染。在他十二岁那年，父亲死于一次车祸。他的母亲早就厌倦自己的丈夫一到夜晚便同那些流亡伴伙混在一起，在火炉旁用她所不懂的语言喋喋不休。于是，她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将德拉克改为德雷克，安德里也变名为安德鲁。

十九岁那年，安德鲁进了大学，由于父亲逝世而中断了的乌克兰教育重又开始。他遇见了别的乌克兰人，并能用父亲的语言同他们流利地交谈。安德鲁拼命阅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乌克兰书籍，仔细研究由乌克兰地下抵抗运动偷运出来的传单，以及《乌克兰论坛报》。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祖国和已死去的父亲的爱变得愈加炽烈，同时也更加厌憎他的眼里的那些迫害者，渐渐地，他把一切的邪恶和罪责都归到迫害者的化身——克格勃身上。

他具有十分成熟的现实观点，他没有接受老一代流亡者那种祖犷外露的民族主义，不赞同他们分离东西乌克兰的观点，甚至也不接受他们的排犹主义思想。他一直默默无声，循规蹈矩，落落寡合。大学毕业后，他到伦敦当了一名职

员。空闲时间里，他纠合了一班与他怀有同样思想目的的人。他仔细寻溯他们的观点，同他们聚会，与他们一起盟誓。他心中一直隐藏着一个梦想，某一天，他会给莫斯科的当权者以沉重的一击，使他们的统治遭受空前未有的震动。

发现米诺斯拉夫·卡明斯基，使他的梦想离现实近了一步。当他再度返回特拉布宗，将到英国去的旅游证件交给卡明斯基，并请求他提供帮助时，德雷克已打定了主意，并为之激动不已。

“我真不知道该帮你什么，安德里。”卡明斯基说道，“虽然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我仍然不能充分相信你。”

“米诺斯拉夫，我说的关于我的情况，每一句都是实情。你不能回去了。如果我代你去，那我必须在那儿取得些联系。要是你知道什么人……”

卡明斯基终于表示了同意。“有两个人，”他说道，“到我们小组被打垮时，他们的身份还没有暴露，没有人知道他们。”

“他们是乌克兰人，而且是游击队？”德雷克急切地问。

“是的。但他们的主要动机和我们不同。他们的人民也在受难。他们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已在劳动营里关押了十年之久，只是关他们的原因不同而已。他们是犹太人。”

“可他们恨莫斯科吗？想打击克里姆林宫吗？”

“当然，”卡明斯基答道，“和你我一样。他们的组织好像是叫作‘犹太人自卫团’。他们的信条同我们的类似，不甘再受奴役迫害。”

“那好，就让我同他们取得联系。”德雷克迫不及待地说。

第二天上午，德雷克拿着那两个年轻的犹太游击队员在利沃夫的地址，飞回了伦敦。不到两星期，他便向代办旅行

社提出了在七月初去基辅、捷尔诺波尔和利沃夫观光旅游的申请。他同时还辞去了工作，将所有的积蓄全兑换成了现金。这样，安德鲁·德雷克，原名叫安德里·德拉克，毫不引人注目的开始了他攻击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战争。

第二章

1982年5月，温暖柔和的阳光照耀在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法国式窗门外，红玫瑰蓓蕾初绽。虽然所有的窗户已经敞开，草坪上芳草和鲜花的幽香飘传进了总统的书房，但屋子里四个人的注意力都毫不外顾，他们的神思全都凝注在一个遥远国家的另一种植物上了。

威廉·马修斯总统背朝南墙，坐在历届总统所曾占据过的位置上，他面前那张古色古香的书桌，朝向北墙的古典大理石壁炉。他的椅子同他的那些讲究奢华堂皇的前任不同，是工厂生产的一把旋转自如的高背椅。正如威廉·马修斯总统的支持者们所说，他总是欣赏一种普通人的、更接近于家庭气氛的风格。但在同他的高级助手们的秘密开会的场合，他则抛开了当年使得公众将他推进白宫的那种温文尔雅，轻声慢语和微笑和蔼的外表。他毕竟是人上之人的总统先生。

坐在总统书桌对面直挺挺的扶手椅上的三个人，是在上午奉总统之命，分别走进总统书房的。紧靠总统的那位是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坦尼斯拉夫·波克维斯基博士。

他同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许多外界人士颇为不解：头发呈亚麻色的总统来自美国中西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新教教徒。而脸色微黑，面孔清瘦的波克维斯基所信奉的是罗马天主教。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举家从波兰移居到

了美国。在对欧洲事务和欧洲人，尤其是斯拉夫人复杂心理的认识了解上，威廉·马修斯总统的缺陷正好由波克维斯基博士弥补得天衣无缝。

坐在总统书桌对面的两个人，一位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另一位是配合中央情报局活动、隶属于美国空军的国家侦察署署长卡尔·泰勒将军。在空军情报系统中，泰勒已是一位两星将军。他的职责是用安装在飞机或间谍卫星上的摄影机，对全球进行图像摄影观察。

马修斯总统将桌上一叠高分辨率照片收拢一起，递给泰勒将军。“知道了，先生们。”马修斯说道。“这么说，你们就是要我看看一小块苏联土地上农作物遭灾的照片。照片上受灾的面积也许有好几英亩吧。可这能说明什么？”

泰勒清了清嗓子。“总统先生，我已冒昧接通了我们的神鹰号卫星此刻转播的图象。您能看看吗？”

马修斯点点头，看着泰勒走过屋子，拧开了西墙上一部电视机的开关。然后，将军走回到书桌前，在六部电话机中拿起一部，拨了个号码，说道，“开始转播。”

对于神鹰号卫星，马修斯总统略知一二。它高翔于人类物体所达到的空前高度上。它所装配的特殊构造摄影机，可以在两百英里的高空，穿透云雾雨雪，看清地面上人的指甲盖，即使在夜间也是如此。它是美国技术的最新最佳成果。

早在七十年代，美国就有了高空图像观察系统。虽然效果不错，但传输却很缓慢。其主要因素是摄影胶片需要卫星在特殊位置上弹射出来，由保护罩封装后自由降到地面。跟踪装置测出其位置后，再用飞机空运到国家侦察署的中心实验室冲洗出来。只有当卫星同美国或美国控制的跟踪系统处于某个特定的弧线位置时，同步卫星传输才有可能。当卫星